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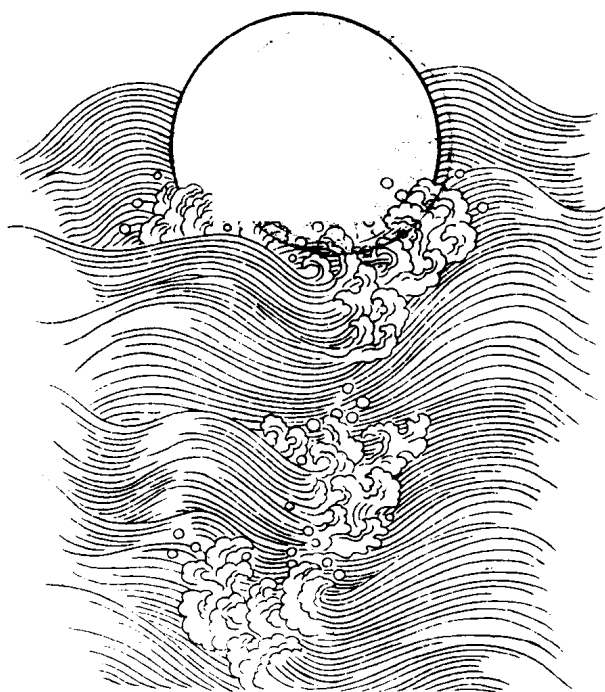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第十五冊
歷史名城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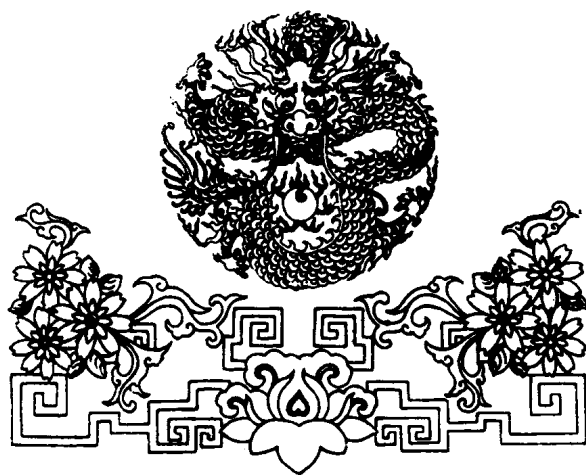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第十五冊

歷史名城之旅



華嚴出版社印行



編著者：文化中國之旅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 編：蔡 君 謨

出版者：華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淑 心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103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307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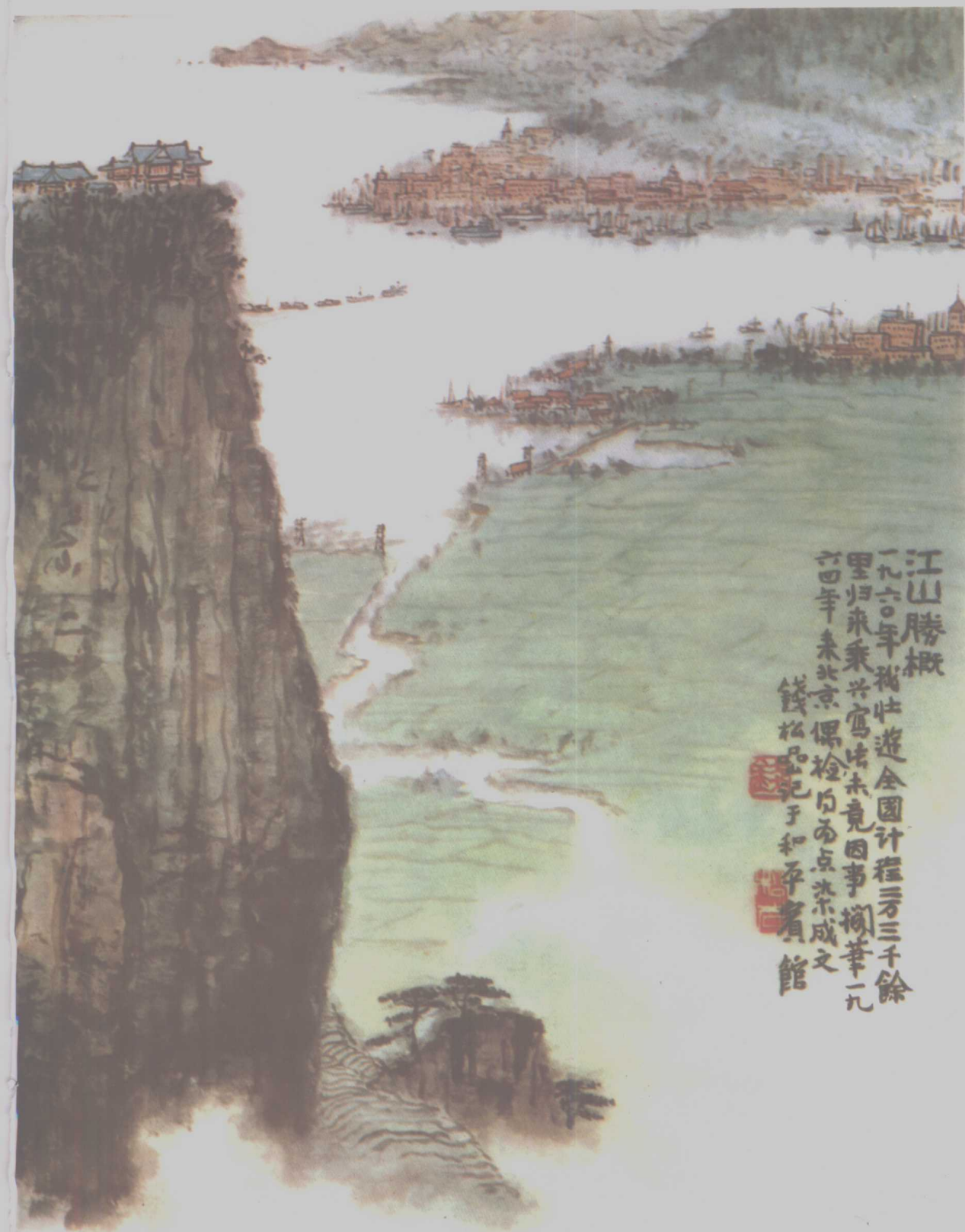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78年 9 月 1 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近人・錢松壘・江山勝概



江山勝概

一九〇年秋壯遊全國計程三萬三千餘
里归来乘兴寫法未竟因事擱筆元
六年春來北京偶檢乃為京榮成文
錢松品記于和平賓館





目

錄

99	91	53	36	30	5	1
第五章	第四章	附 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序言
大同	太原		承德	邯鄲	北京	

201	175	166	158	125	121	110
附 盛世滋生圖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蘇州	揚州	徐州	南京	遼陽	瀋陽

序言

早在原始社會，人類爲了生產和生活的方便，常常聚族而居，形成原始聚落。西安的半坡，餘姚的河姆渡，都是這種原始聚落的例子。隨着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聚落不斷擴大，而大型的聚落，最後就可能形成城市。〔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說：「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這裏所說的建城的目的，主要還是出於軍事上的需要，而且在夏代初期，是否確有築城之事，畢竟還是一種傳說。不過，根據近年來考古發掘所提供的資料，中國在夏、商時代，確實已經有了城垣建築。當然，城垣的建築並不一定就是城市出現的標誌，但是這些早期的城垣，作爲大型聚落形成的信號，看來倒是十分可能的。而大型聚落與城市之間的差異，往往很難嚴格加以區別。無論如何，大型聚落的出現，總是城市誕生的前奏。

對於大型聚落和城市的區別，或者說城市成立的條件，學者們的意見自來並不統一。日本學者狩野千秋在其所著〔馬雅的神殿城市〕（日本每日新聞社出版〔古

代文明之謎及發現〕之六〔巨大遺跡〕一文中，綜合過去西歐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意見，把古代城市形成的條件，歸納爲下列七個方面：一，最原始的國家組織與王權的確立；二，稠密的人口；三，社會階級的分化與職業的專業化；四，巨大的紀念性建築物的建造；五，文字、金屬器的發明與科學技術的發達；六，由於剩餘物質的生產而出現了有餘暇從事知識性的活動；七，工商業與貿易組織的發達。

根據上列七條，狩野千秋把西元六世紀前後在今墨西哥尤卡坦半島、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發展起來的大型馬雅人聚落都列爲城市，就是他著作裏詳細描述的馬雅的神殿城市。由於這七條都只有性狀的描述却不作數量的分析，所以從實際情況來看，除了第四條「巨大的紀念性建築物的建造」外，這些馬雅城市的發展水平還是很低的，其中有一些與大型聚落之間，很難加以區別。

在中國，古代城市的出現，一大部分是聚落逐漸擴大的結果。這當然是和城市

所在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因素有密切關係。例如，在中原地區的坦蕩大平原上，崛起於沖積層上的孤立丘阜，由於在燃料、飲水、背風向陽和防守等方面都處於有利地位，因而常常成爲建立聚落的理想地址。這類聚落，以後有許多就發展成爲城邑，諸如頓丘、鐵丘、商丘、營丘、章丘、乘丘等等，無法一一列舉。另外一部分古代城市，是從頭勘測設計，然後施工建築而成的。這中間，洛陽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尚書·洛誥〕說：「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這裏的所謂「告卜」，既是古代的一種儀式，但也具有勘測意義。〔水經·洛水注〕說：「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邙山，以爲天下之漕。」

如上所述，把都城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地理位置上，不但在地形上背山面水，在

交通運輸上處於樞紐的地位，而且事前曾經繪製地圖。這樣的建城，與其說是占卜所得，毋寧說是勘測的結果。因此，上述〔洛誥〕的記載，乃是從勘測設計直到建城的一個完整的記錄。

西周以後，從東周、春秋、戰國以至於秦，建城的記載，史不絕書，僅僅見於〔水經注〕一書中的，就已經充篇累牘。例如〔澮水注〕的「城絳」，〔濟水注〕的「城陽向」，〔濁漳水注〕的「築五鹿、中牟、鄴」，〔潁水注〕的「城上棘」，〔濰水注〕的「城諸及鄆」和秦始皇的琅邪郡城等等。這些記載中的城邑，有的可能從大型聚落發展而來，也有的可能是新建築的。當然，這一時期建築的城郭，往往都是當時的重要都會或軍事要地。對廣大的一般縣邑，恐怕還沒有普遍建立城郭，全國縣邑的普遍建城，為時當在漢朝初年。〔水經·河水注〕說：「漢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從此，全國各地普遍建城郭。隨着生產的發展，戶口的增加，大型城邑也就陸續出現。因此到了漢代，我國各地的城市已經相當發達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被稱為「都會」的城市，就有邯鄲、燕、臨淄、陶、睢陽、吳、壽春、番禺等。這些城市、腹地寬廣，交通便利，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商業發達

。因此城市的規模已經相當龐大。以睢陽城為例，這個城市於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年）由文帝少子劉武加以擴建，據〔漢書·梁孝王傳〕的記載，城周長達「七十里」。這就是上列被司馬遷稱為「都會」的城市的一般規模。

除了如上所舉的特大城市以外，一般城市從漢代起也有很大的發展。由於歷史記載的疏缺，作為城市重要指標的經濟和人口資料，要普遍地獲得具體的數字是十分困難的。因此，行政建制在中國歷史城市的確定上就成為十分重要的依據，有時也是唯一可循的途徑。大體上說，把建有縣治的這一級城邑作為歷史上的城市，恐怕比較符合實際。從漢到清的歷史中，中國行政區劃中的縣一級的數字，基本上是穩定的，約在一千三百個左右。這也就是歷史上中國一般城市的約略數字。

現在，我們通常把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和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這種過程，稱為城市化。城市化的過程，不僅使城市的數量增加，而且還使各個城市的人口和規模不斷擴大。因此，城市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就不斷提高。在我國，這種城市化的進程，到了唐朝後期，顯然有了加速。美國學者施堅雅在他主編的巨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把中國出

現的這種情況，稱為「中世紀城市革命」。根據他的分析，從唐末到北宋，在中國發生的這種市場與城市化的革命，表現為下列各種現象：一，放鬆了每縣一市，市須設立於縣城的規定；二，官市組織衰弱，終至瓦解；三，坊市制度消滅，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規劃，可以在城內或四郊各處進行交易買賣；四，某些城市迅速擴大，城郊商業區蓬勃發展；五，出現了具有重要經濟意義的大批中小城鎮。

按照施堅雅的統計，八世紀的長安（今西安）人口達一百萬。北宋的東京（今開封），在其最後年代，人口為八十五萬。南宋的臨安（今杭州），在其最後年代，人口達一百二十萬。這些城市，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施堅雅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又指出：「一些熱心的作者，也曾主張中世紀時期，至少有六七個中國城市，人口達到一百萬，或者還要多些。」這些都說明，自從唐末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了加速，出現了不少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南宋以後，中國的大城市在世界上仍有一段時期保持優勢。關於這方面，我們可以引用施堅雅在該書導言中的一段話：「與中世紀的長安、開封與杭州，先前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一樣，南京在明改建以

後的十年左右時間內趕上開羅，成爲世界最大的城市，至十五世紀某一時候爲北京所代替。除了十七世紀短時期內，亞格拉、君士坦丁和德里向其居首位地位挑戰外，北京一直是世界的最大城市，直到一八〇〇年前後倫敦才超過它。」

時至近代，由於出現了城市化的進程與工業化的進程同步發展的情況，於是，與工業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顯得緩慢了。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城市的數量以及城市建設等許多方面，中國都顯得落後，此外，由於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城市佈局開始顯出極不平衡的狀態。原有的在內地的大城市不斷衰弱，而作爲列強經濟侵略基地的港口城市，例如上海、天津、廣州，則畸形地發展起來。

今天我國的各類城市，絕大部分都是從歷史上的城市發展起來的。雖然近代以來，我們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設中顯得落後，但是，我們擁有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而龐大的城市體系，這無疑是我們值得自豪的歷史遺產。爲此，我們把年代久遠、文物豐富、包括歷史上燦爛一時的六大古都都在內的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和其他二十個歷史上的各類著名城市，一共五十個城市，編成了這本《中國歷史名城》的地理讀物。各個城市的作者，都是在這些城

市定居的或者是做過研究考察工作的專家學者。這些作者對於他們所撰寫的城市，不僅有豐富的感性知識，而且還有系統的理性知識。爲此，在介紹每個城市的短小的篇幅中，一般都能比較清楚地刻畫出它的主要面貌。當然，由於作者較多，各人在寫作的體例、文風和內容的重點等方面並不一致。而且，從全書來說，我們所選擇的城市在地理分佈上還不夠平衡，邊遠地區的城市選得較少，有好幾個省區還是空白。對於這些缺陷，我們將在以後加以補足。

本書所選的這五十個城市，在我國的歷史名城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對於這些歷史名城的歷史回顧和現狀觀察，對我們既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教育。它們讓我們博覽歷史上的光輝文物，大開眼界；讓我們廣聞歷史上的生動掌故，增長知識。通過這些歷史名城的創業和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許多古代優秀人物艱苦創業的不朽事迹，和廣大勞動人民在這些城市发展過程中所歷盡的風霜雨雪。通過這種了解，將使我們進一步懂得，應該怎樣承前啓後，爲建設我們偉大繁榮的現代化城市而貢獻我們的精力。

第一章 北京

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其輝煌的殿宇、秀麗的園林，以及幽靜的四合院，使人留連忘返。

從古老的城邑，到今天北京城經歷了千百年的發展、巨變。

北京城座落於三面環山、面積不大的平原上。這塊平原通稱「北京小平原」。小平原的北部和東北部，屬於燕山山脈的軍都山。西部是太行山的北段，稱西山。北京小平原的地勢向東南微微傾斜延展，最後沒入遼闊的華北大平原。從北部、西部的山地中，一系列大小河川奔流而出，順著向東南傾斜的地勢，匯入海河，流進渤海。其中較大的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這裏的氣候屬於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天寒冷乾燥，夏季炎熱多雨，年平均降雨量六百四十毫米，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於夏季。今天北京郊區的平原上，一片良疇沃野，但在遠古時期，却佈滿湖沼。這些湖沼是在數千年人類開發的影響下，逐漸消失的。北京城本身，也正是在這些開發活動的基礎上，誕生成長起來的。

遠在約六十九萬年前，北京西南郊的

周口店地區，已經有猿人在那裏生活，他們就是舉世聞名的「北京人」。在「北京人」住過的山洞裏，發現了埋藏豐富的原始人類化石，以及他們使用過的工具、火種遺迹和古生物遺骸。「北京人」處在原始社會初期，過着群居的生活。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撫育後代，他們憑藉由木棒和石頭製造的最簡單的工具，從事狩獵、採集，與自然界進行艱苦頑強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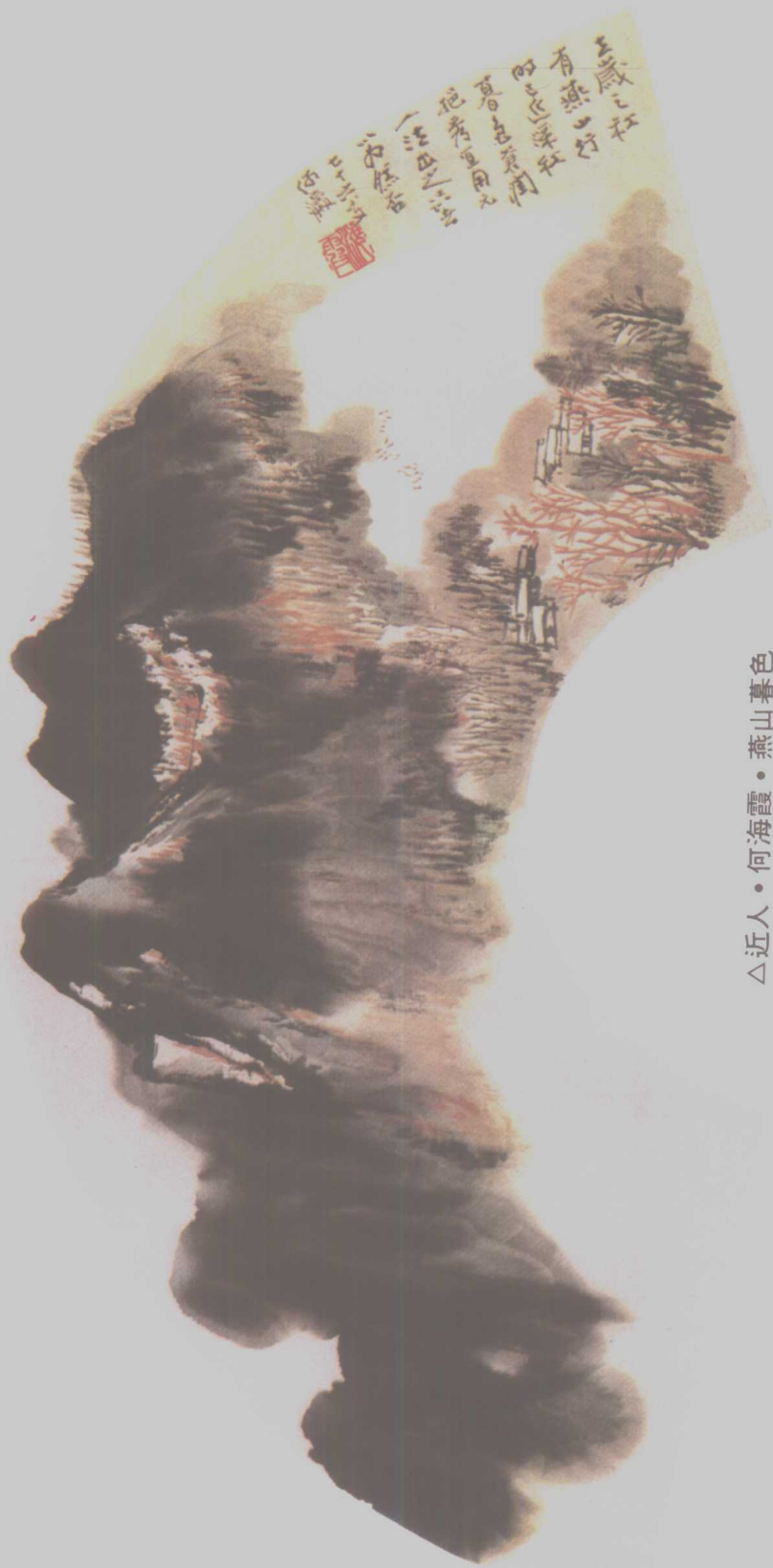
經過幾十萬年的漫長歲月，到距今大約五六千年前的時候，北京地區也像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進入了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出現了。北京西部和北部的淺山谷地，以及山麓地帶，尤其是河流的沖積扇部分，是較早得到農業開發的區域。今天，在這些地方，最易發現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根據考古學家的器型學研究，北京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既有中原的仰韶、龍山文化的特徵，也有東北地區紅山文化化的特徵。這說明，在遙遠的古代，北京地區便與中原和東北有了較爲密切的聯繫。

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大多結束了以採

集和狩獵爲主的遷移不定的生活，而過渡到以農牧爲主的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導致了固定居民點——原始聚落的形成。北京昌平縣雪山村，有一處文化內涵較爲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此發現了不同時期的文化遺物，說明這裏曾是人們長時期生活的地方，農業生產和定居生活，會積聚起較多的人口，並促進穩定的、持續性的地區開發。在新石器時代，北京地區的人們砍伐林木、芟除草萊、播種穀物、開闢田園，開始改變了原有的自然景觀，並獲得越來越多的勞動產品。

當三千多年前，以青銅器爲重要特徵的商朝文化在華北平原的中部燦爛發展時，北京地區由於位置偏遠，社會發展的水平並不高。這裏的居民是一些不同於商人的其他部落。雖然他們在文化面貌上受到商文化的強烈影響，但在政治關係上，並不受商朝的直接統轄。

西元前十一世紀初期，興起於黃河中游高原地區的周人，取代了商人的地位，建立起更加強大的王朝。周朝採用分封諸侯的辦法，將自己的直接統治區迅速擴大



△近人·何海霞·燕山暮色



△近人·钱松喦·太行山村

。北京地區就是在這個時候，以封國的形勢，加入了周朝的政治體系。

最初，北京這塊地方分屬於兩個封國。北部的大部地區屬於薊國，西南一角屬於燕國。燕國是召公奭的封地，薊國據說是黃帝後裔的封地。在西周的各個封國中，都有一座都城，作為封國的統治中心。燕國的都城在今北京房山縣境。今房山縣琉璃河古城即其遺址，薊國的都城即薊城。位於今北京市區的西南隅，大致在廣安門附近。燕薊兩國並沒有共處多久，後來燕國吞併了薊國，並把自己的國都遷到薊城。這樣，燕國便成為當時北京地區唯一的諸侯國，而薊城則一躍成為古代北京地區唯一的中心城市。

古老的薊城是最早的北京城的前身，它的誕生和成長，掀開了北京城歷史長卷的初章。

那，為什麼北京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在這個位置上形成？為什麼這座城市歷久不衰，不斷壯大？這一位置有什麼優越性呢？

從小區位置來看，薊城恰好位於古代永定河沖積扇的脊背上，有良好的排水條件。另外，它又靠近沖積扇上一條潛水溢出帶的東側，這裏既有豐富的地下水，也有充沛的地表水，滿足了薊城早期發展的

需要。

從大的區域範圍來看，薊城正處在我國北方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位置上。

三千年前，在薊城開始興起的時候，華北平原上還是湖泊密佈，道路阻隔。自中原北上的道路，只有在太原的西側和太行山的東麓地帶形成。這條南北通道要跨越一系列東西流向的河流。永定河位於大平原北端，是大道北行最後的一個渡口。越過這個渡口，便進入北京小平原。大道在這裏分為三條：一條向西北，穿過今南口峽谷而直上蒙古高原；另一條向東北，進今古北口，經過一片低緩的丘陵山地，進入東北大平原；第三條向正東，沿燕山南麓前進，經濱海走廊而達遼河下游平原。

這一道路形勢，在我國北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正是以這幾條大道為骨幹的交通體系，而將中原、東北和蒙古高原這三大地區緊密地聯繫起來。薊城在這幾條大道的交匯點上形成，具有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優越地位。這一點，乃是薊城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在薊城到北京城的發展過程中，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燕國以北京小平原為心，不斷壯大力量，擴充領土。從春秋到戰國，燕國已成為七雄之一。其都城薊也成為「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到西元前二二六年，秦國

大將王翦攻拔薊城，之後不久，燕國滅亡。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統一全國後，原來燕國的領土被分為六郡，其中廣陽郡的治所就設在薊城。薊城位於秦朝版圖的東北部，是通往東北地區的重要門戶，從都城咸陽修築的馳道，向東北可直抵薊城。

從秦朝開始，薊城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在漢族王朝和東北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漢族統治者勢力強大時，必定要以薊城作為經略東北的基地。反之，每當中原漢族統治者勢力衰弱，東北的少數民族乘機南下的時候，薊城則往往成為他們進入中原的門戶和跳板。而在和平安定的歷史時期，薊城便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貿易中心，在促進漢族與北方的少數民族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上，發揮組帶的作用。

西漢初期的薊城，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描繪的，它算得是渤海碣石間的一大都會，南通齊趙，東北又和胡人接壤……這裏富有魚、鹽、棗、栗的出產，北邊鄰近烏桓和扶餘，向東又足以交流穢貉朝鮮和真番的物資。處於這樣一個貿易都會的地位，薊城本身也一定會有迅速的發展。淪陷以後，在北京宣武門到西便門一帶，曾出土大批戰國秦漢時代的井圈，其

數量之多，分佈之密，足以說明當時城市人口的繁盛。兩漢時期，北京小平原也得到進一步的開發。東漢有位叫張堪的漁陽（今北京懷柔、密雲一帶）太守，曾發民墾闢水田八百頃，引種水稻。漢朝廷還在漁陽設立鐵官，掌管這一帶的鐵器生產。

在三國時代，為了解決農田用水，在薊城近郊興修了一座較大規模的人工灌溉工程，即戾陵遏與車箱渠。戾陵遏是一座攔水壩，建造在灤水（今石景山南麓永定河）上。車箱渠是一條引水渠，它把戾陵遏分出的河水引入高粱河的上游，在高粱河兩岸再開支渠。這樣，便使兩千頃土地得到了灌溉。戾陵遏與車箱渠的修建，開創了北京地區大興水利的先聲。

隋唐時代的薊城，不是以經濟文化，是以前顯赫的軍事地位聞名於世。隋煬帝和唐太宗在全國平定統一之後，都曾利用薊城（隋朝稱涿郡，唐朝稱幽州）作為基地，向東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戰爭。隋煬帝時，涿郡是兵馬糧餉的集結之地。史書記載：「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向涿郡運送糧餉的船隻「相次千餘里」。唐太宗也曾親自統率主力大軍，在幽州城誓師。作為百萬大軍的集結地和天子誓師的大本營，一方面使幽州城為海內矚

目，地位提高，另一方面却破壞了這裏經濟的正常發展，增加了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的負擔。唐太宗退兵時，曾在幽州城東南隅修建了一座悼念陣亡將士廟宇，命名為憫忠寺。其後，大廟經過多次重修，改名法源寺，至今仍為北京市區重要的寺廟之一。

唐朝中期，政局混亂，勢力衰弱。而這時，北方的一些民族逐漸強大起來。因此，唐朝在沿邊一帶，設八個節度使，代表皇權，率兵駐守。幽州城便為其中之一，號稱范陽節度使。西元七五五年，身兼范陽、平盧（遼寧朝陽）、河東（太原）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起兵幽州，發動了有名的「安史之亂」。從此以後，唐朝便一蹶不振了。

唐代曾建立起空前規模的多民族國家。地處中原、東北、蒙古高原三大地區交通樞紐地位的薊城，自然成為北方各民族彼此交流、相互融合的大熔爐。例如，唐高祖初年有靺鞨人千餘戶遷入幽州城；唐太宗時有一部分突厥人移入幽州地區。另外，還有奚、室韋和契丹人到幽州一帶居住。這些事實說明，北京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和勞動的地方，正是他們創造着古代北京的歷史。

從秦漢和隋唐這一千餘年間，薊城（

幽州）城市自身也不斷發展。自西元十世紀始，中國北方的歷史，由於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大舉南下，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薊城也在這新的歷史洪流中，一步步過渡、飛躍為全國的首都。這一巨變的起點，是遼南京的設立。

唐朝以後，中原又陷入分裂的局面，而東北地區的契丹族却逐漸強盛起來，於西元九一六年，正式建立契丹政權。隨後向南發展，吞併了華北地區包括幽州在內的燕雲十六州，改國號為遼，並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稱為南京。其目的是要以此作為經營華北並繼續南進的據點。

遼南京是遼代五京中最大的一個。它基本上沿用了唐代的幽州城址，祇是重修了城牆和在西南隅建造了一個不大的宮城。據記載，南京城「方圓三十六里，高三丈，寬一丈五尺」，有八座城門。宮城內有元和、昭慶、嘉寧等宮殿，還有果園、湖泊以及供帝王遊幸的球場。南京城內分三十六坊，街道房舍井然有序。城市人口達三十萬，除漢、契丹以外，還有奚、渤海、女真和來自西域的少數民族。

佛教在遼代大為盛行，南京城內外興建了不少規模宏麗、造型精巧的寺廟殿塔。今北京廣安門附近有座天寧寺，創建於北魏，後代屢次重修，寺名亦多次變化。



△近人·李颖·渤海波涛



△北京人遗址